

全球化与中国人口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当今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且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全球化、国际移民以及文化多元化等方面, 讨论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机遇与挑战, 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实际上为中国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 一个更大的施展竞争力的舞台。全球化对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提高现有的、未来的人口素质, 把中国人口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 汇入全球化人力、人才竞争的时代。

【关键词】 全球化; 中国人口; 机遇; 挑战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29X(2002)03-0014-06

【Abstract】 At present,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and is exerting a tremendous influence and lots of chang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our life and its development. It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to discuss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that globalization brought to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pluralistic culture. Globalization is actually providing a larger space for Chinese population to survive and a bigger stage to show its competitive ability. The greatest challenge that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to Chinese population is to improv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population quality,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global human resources and talented competition era.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ese population; opportunity; challenge

一、引言

20世纪末“全球化”成为流行的话语, 尽管全球化的学术争论日益激烈, 但全球化还是反映出一种广泛的认识, 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 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空间,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相互联系的扩大、深化以及加速。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认为, 全球化概念首先意味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活动跨越了边界, 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距离遥远的地方的个人和共同体产生影响。而且, 随着世界范围内通讯运输系统的发展, 产品、资本、信息、人口以及观念在全球流动的速度会不断加速, 因此国家、地

区之间相互联系的广度和强度会不断提高 ([英]戴维·赫尔德等, 2001)。事实上,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全球化都是一种重要的客观事实, 是一种或者一组进程,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我们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从经济到政治、文化、法律以及环境领域, 从物质到观念上全球化也将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毫无疑问, 全球化也同样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口, 影响到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再认识, 影响到未来我国人口战略。虽然全球化从概念、理论上还不太成熟, 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 但并不妨碍我们把正在经历的全球化作为研究我国具体问题 (如人口问题) 的重要背景参照。在全球化背景之下, 在全球化进程当中, 中

[收稿日期] 2001-01-06

[作者简介] 李建新(1962-), 男, 新疆伊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博士。研究方向: 人口理论、社会学。

国人口将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将试图从经济全球化、人口迁移以及文化多元化等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二、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机遇与挑战

1.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自由贸易，逐步加入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行列。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从表 1 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都有了长足的发展。1980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4 518 亿元，1999 年增长到 81 911 亿元，增加了 17 倍。

同期，进出口贸易增长更快，从 1980 年到 1999 年，我国出口额增长了近 60 倍，进口额增长了 45 倍。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980 年的 6% 上升到 1999 年的 20% 左右，出口位次也由世界排名第 26 位上升到第 9 位。1978 年以来，中国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已达 30 多万家，实际利用外资截止到 1999 年累计已超过了 3 000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即使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在当今世界经济一片低靡之中，中国经济也一支独秀仍保持健康发展。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表 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出口 (金额单位: 人民币亿元)

年份	GDP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比重	出口位次
1980	4 518	271	299	6.0	26
1985	8 689	809	1 258	9.0	17
1990	18 598	2 986	2 574	16.1	15
1991	21 662	3 827	3 399	17.7	13
1992	26 652	4 676	4 443	18.5	11
1993	34 561	5 285	5 986	15.3	11
1994	46 670	10 422	9 960	22.3	11
1995	58 495	12 452	11 048	21.3	11
1996	67 850	12 576	11 557	18.5	11
1997	73 143	15 161	11 806	20.7	10
1998	78 018	15 232	11 626	19.5	9
1999	81 911	16 160	13 736	19.7	9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0 [M].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我们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资源（耕地、森林、水、矿产等）却相对匮乏，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当我们静态地以惯常的人均分母效应去分析人口与资源关系时，百分之百地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并且会把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引向控制人口数量的单行道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之下，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却并不那样令人悲观。以中国的粮食为例，自美国学者莱斯特·布

朗 (Lester R. Brown) 1994 年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广泛的争议之后，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中国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最重要的是发挥它的比较优势。中国虽然耕地稀少、水资源短缺，但中国最大优势之一是人口众多。中国应该多生产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农产品、工业品，并以这些产品通过国际市场、国际贸易换取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即使对粮食这种特殊战略商品，中国仍然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调剂中国粮食所需的 20%—30% (南方周末, 1996, 11.8)。实际上，

我们进口粮食，意味着我们在“进口”我国的稀缺资源——耕地、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意味着我们在发挥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近几年我国农业、农产品的发展也证明了我国经济学家的分析。1999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128亿美元，远超过同期70亿美元的进口额。这表明，作为资源优势的中国人口，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供养着世界。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口更多的国际资源，吸收更多的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利用更大的国际市场，以弥补中国资源资本的短缺。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如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劳动力，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工业品，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是在“拿进来”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源，“送出去”那些处于比较优势的资源，从而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当我们打开国门，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我们也就超越了传统的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土界限，打破了简单封闭的人口资源对比关系，突破了各种资源短缺的限定。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中国人口数量有了发挥自身潜力的良好机遇。中国人口不再仅仅是中国领土上养育的人口，也不再仅仅是养育着中国自身的人口，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

2. 中国人口与国际迁移

纵观人类人口史，人口迁移大概是最早最为普遍的全球化形式。不过，大规模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今天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是全球化移民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出境人员（含外国籍）达1.1亿人次，2000年，出境人员上升到1.9亿人次。中国公民因私出国2000年为497万人次。与此同时，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口在不断地增加。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985—1990年，海外移民约24万人，属于世界上人口迁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些迁出人口中，青壮年人口为多数，50%的移民年龄为25—35岁，70%的移民年龄在20—40岁；而65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

下少年儿童仅占移民的0.8%和3.8%。移民人口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化素质较高。在移民人口中，有42%和11%以上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和专科的程度，仅有7.52%的移民具有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而同样在整个大陆人口中仅有0.55%和0.39%的人受过大学本科和专科教育。就教育年限而言，15岁以上移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而大陆人口平均仅为6.4年，不足移民的一半。可以说，当代中国移民多是年轻而有文化的群体。此外，从移民人口来源的分布来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和传统上华侨较多的地区的迁移数量较大。上海、北京、福建、广东和江苏五省市移民超过万人，占全部移民的74%，相反，西部省市的移民仅占全部移民的6%（黄润龙等，1998）。目前，中国大陆公民出国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智力型，即留学生、访问学者、各类技术人员等；劳务输出型；家庭团聚型以及外交公务型。不过对中国人口产生主要影响的是留学人员与劳务人员两类。

近代中国人留学出国大约始于19世纪中叶，1848年容闳等三人赴美留学标志着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国留学走向了正轨。不过，解放后前30年，中国出国留学不仅人数少、波动大（见表2），而且由于冷战格局，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例如50、60年代，留学生中有79%是到前苏联留学，其他是到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到西方国家几乎是空白。1978年6月邓小平提出增大向外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决策以后，中国海外留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表2可以看到，1978年以后，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急剧增加。据有关部门估计，从1978年到2000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36万左右，再加上10万多人先以其他身份出国，尔后在国外转为留学身份的，这样共计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近50万人。其中，国家公派5万余人，单位公派10万余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30余万左右。他们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以上又集中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蒋国华，2001）。当今中国出国留学无论是范围广度（世界各地）上，还是在规模幅度、流动速度上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表2 历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单位:人)

年份	出国留学人员	归国留学人员	年份	出国留学人员	归国留学人员
1952	231		1989	3 329	1 753
1957	529	347	1990	2 950	1 593
1962	114	980	1991	2 900	2 069
1965	454	199	1992	6 540	3 611
1975	245	186	1993	10 742	5 128
1978	860	248	1994	19 071	4 230
1980	2 124	162	1995	20 381	5 750
1985	4 888	1 424	1996	20 905	6 570
1986	4 676	1 388	1997	22 410	7 130
1987	4 703	1 605	1998	17 622	7 379
1988	3 786	3 000	1999	23 749	7 748

资料来源: 同表1。

我国劳务人员输出近 10 多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49 年至 1976 年我国官方组织的劳务输出几乎为零。1978 年以后, 我国劳务输出人口逐年增多。1979 年, 2-3 万劳务合作人员进入伊拉克、香港、澳门等劳务市场; 80 年代 3-4 万左右劳动力进入世界劳务市场。90 年代中国国际劳务市场进入了加速期(见表3), 1992 年劳务人员超过 10 万; 1995 年超过 20 万; 1999 年

更是超过了 30 万, 达到 326 494 人。与此同时, 劳务人员的输出分布也有了很大的变化。80 年代, 中国劳务输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90 年代, 输出到发达国家的比例在提高。中国向外输出的劳动力吃苦耐劳, 勤奋工作, 赢得了信誉。目前, 中国劳务输出正朝着多国家、多领域、多层次方向发展。

表3 90 年代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出国人数(单位: 人次)

年份	人次	年份	人次
1990	36 116	1995	225 915
1991	68 314	1996	246 598
1992	105 564	1997	285 529
1993	139 431	1998	290 771
1994	184 328	1999	326 494

资料来源: 1999 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M]. 中国统计出版社。

尽管留学生和劳务输出人员之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总人口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 但可以说, 他们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已经累计派出公费留学人员 30 多万人, 学成回国的约 1/3。对此, 关于中国人才的“脑流失”曾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从长远来看, 即使许多留学海外的人员没有回国直接为祖国效力, 但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为祖国的建设作贡献。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海外华人华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 从文化意义上讲(下节论述), 留学生是中

国文化的使者、传播者, 他们将在全球化进程中, 为全球的文化多元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可以预见, 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还会加大。这是由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人口的二元结构所决定的。美国人口学家皮特·麦克汤纳(Peter. McDonald) 研究指出, 未来 30 年或 50 年,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而将面临劳动力短缺, 将严重地影响其经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向发达国家是在所难免的(Peter. McDonald, 2001)。

3. 文化挑战与中国人口

1993年夏，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广泛争议，特别是中国学者强烈的反响。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对抗结束之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而展开，而是以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展开。而未来文明之间冲突很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20世纪后半叶，国家地区间的冲突如前南斯拉夫、车臣、克什米尔、中东等地的战争以及21世纪“9·11”骇人听闻的国际恐怖事件，似乎都在验证着亨廷顿的预言。

人类未来的冲突要如何避免，不同的文明文化又如何和平共处，这是在这个人口还不断增长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1997年12月塞缪尔·亨廷顿在为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到：文明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许多多不同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赛缪尔·亨廷顿1999）。在多元文化的新世纪里，各种不同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我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早在1990年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怎样能够和平共处确实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只有“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实现）天下大同”（费孝通，1993）。在21世纪之初，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之下，费老又撰文指出，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费老期待，世界最终能进入“和而不同”的境界（费孝通，2001）。

21世纪是一个文化多元多极的世纪，即使中国经济和国力十分强大之后，中国也不会谋求中国强盛之后的所谓“中国世纪”。不过，在文化多元的世纪中，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必将对建构新世纪的多元文化和世界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就指出，未来

的200年将表明，中国人何去何从，将是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美]伯特兰·罗素，1996）。罗素还真诚地希望作为中国人从西方学习科学知识的一种回报，中国能给予西方巨大的忍耐精神和善于沉思的恬静心境。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认为，在21世纪多种文化并存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如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都可以为解决好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资源。中华文化不仅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层面也会对21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汤一介，2001）。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一种对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有关学说持尊重和宽容态度的普遍意愿。这种宽容不是漠不关心式的宽容，而是出于尊重和重视世界上所存在的、在历史上出现的其他基本信念而产生的宽容（[德]赫尔穆特·施密特，2001），中国文化中的宽容、包容以及坚韧精神正是全球文化多元化中所最需要的宝贵财富，显然，在人类发展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理应肩负起一份重任。

如何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呢？我们知道，文化文明的载体是一定规模数量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人口又多了一份重任。实际上，中国学者在解读亨廷顿的系列文明冲突论时已经发现，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西方人口数量缩减的忧虑。西方把现代化交给世界的同时，其人口数量在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仅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李慎之，1997）。1950年，世界人口为25亿，西方发达国家为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2%，2000年世界人口已突破60亿，发达国家人口还不足12亿，占不到世界总人口的20%。据美国国情调查局估计，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和10%是亚裔人。可以看出，2050年实际上是欧裔白人从多数变为少数的临界点。因此，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

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随历史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李慎之，1997）。或许今天由于中国号称人口第一大国，人们不会象亨廷顿先生为西方人口的衰落忧虑而也为中国人口数量担忧。但是，当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数量）发展战略，不能不警惕有一种中国人口数量太多、压力太大的悲观情绪在弥漫主导着我们的视线。目前，我国人口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按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如果在21世纪上半叶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9（目前还低于这个水平），2050年中国人口将由2040年的峰值15亿多降至14.7亿，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89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由现在的1/5降至1/6。按照中国一些学者的预测，如果生育水平一直保持现有水平（TFR为1.8左右）甚至更低，那么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降至10亿左右或10亿以内（李建新，1997）。届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1/10。世界人口史上，中国人口数量一直举足轻重，自有了较准确的世界人口数量统计以来，中国人口基本上都占世界人口的1/4至1/5强。因此，21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人口迅速下降之时，或许就是中国人口数量忧虑之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然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人口活力的注入，世界多元文化需要中国文明的贡献，而中国文明的载体又需要中国人口，我们为什么总是盯着人口数量的负担，而无视人口数量的潜在优势呢？事实上，中国人口不仅可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更可以背负起一份人类进步与和平的责任。试想，当作为中国文化特质的载体——中国人口融入世界人口之中时，中国人口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福音，是和平进步的使者。在全球化的视角之下，我们真的需要再次审视一下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认真思考一下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战略。

三、结语

不难看出，全球化实际上为中国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一个更大的施展竞争力的舞台，全球化视角让我们增添了一份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信心和乐观。那种一味强调中国庞大的

人口压力，强调人口的分母负效应，追求远期所谓缩减人口最佳规模的观点，显然是狭隘的，也是缺乏远见的。全球化对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不是控制缩减人口数量，而是如何把中国人口的潜在数量优势发挥出来，对世界人口和人类未来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再是什么单纯控制数量问题，而是迅速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30年前，我们曾将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了控制人口数量的“战役”之中，而今，该是我们转向的时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现存的、未来的人口素质，汇入全球化人力、人才竞争的时代。

【参考文献】

- [1] [英] 戴维·赫尔德等.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 黄润龙等. 近十年我国大陆海外新移民 [J]. 人口与经济, 1998, (1).
- [3] 蒋国华. 迎接21世纪出国留学新时代 [J]. 21世纪, 2001, (1).
- [4] Peter McDonald & Rebecca Kippen. Labor Supply Prospects in 16 Developed Countries, 2000-205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7 (1), MARCH 2001.
- [5]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6] 费孝通. 人的研究在中国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 [7] 费孝通. “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 [J]. 读书, 2001, (4).
- [8] [美] 伯特兰·罗素. 罗素文集 [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6.
- [9] 汤一介. “拿来主义”与“送出主义”的双向互动 [J]. 新华文摘, 2001, (9).
- [10]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全球化与道德重建 [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1] 李慎之.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J]. 读书, 1997, (6).
- [12] 李建新. 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 [J]. 人口研究, 1997, (1).
- [13] 刘金塘, 林富德. 从稳定低生育率到稳定人口 [J]. 人口研究, 2000, (4).

[责任编辑 韩瑗瑛]